

• 社会学研究 •

生活质量与社会质量： 一项有关理论和方法论的比较研究

林 卡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27)

摘要:生活质量理论和社会质量理论都采用社会指标进行社会测量,但其方法和侧重点各有不同。生活质量理论的视野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的生活状况及其水平的提高,而社会质量理论的视角则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的特点。基于亚洲社会质量研究联合会所进行的社会调查数据,从这两个视野同时对资料展开分析,展示这两个理论在方法论上所具有的差异和特点,可以看出,我们在强调社会质量理论的运用时,不能低估生活质量所具有的政策意义。同时,由于中国正在经历着快速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倡导社会质量理论对于我们提升社会和谐程度、增进人民福祉,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所以,两种理论的导向和分析方法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关键词:社会指标;生活质量;社会质量;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5)02-0059-08

一、导言:生活质量、社会质量和社会指标

以可靠的数据和强有力的逻辑来科学地反映社会事实,是社会科学长久以来追求的目标。要反映社会事实需要有经验资料,包括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和统计数据等形式所采取的研究资料。在此,社会指标的使用就成为十分有用的工具。它帮助我们确定从什么方面和怎样收集经验资料,以及如何通过这些资料来服务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以往的社会研究中,一些社会指标体系为我们理解社会状况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包括生活质量指数、社会进步指数、幸福指数,以及人文发展指数等。这些指标体系都需要有理论支撑,从而使我们可以把一系列社会现象放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研究,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现象,例如人文发展指数的发展就要有人类安全理论的支持。推进理论发展之所以十分必要,是因为理论假设决定了指标体系的设计和指标的选择,也为解释社会现象提供具有意义的研究假设。

在与社会指标相关的各种理论中,生活质量理论和社会质量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生活质量理论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历史。

收稿日期:2014-07-17

作者简介:林卡(1961—),男,浙江衢州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和风险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社会管理和社会工作。该文发表于《International Sociology》,2013,28(3)316-334,中文翻译由许芸承担。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会质量重要项目“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11AZD087)的阶段性成果。

在早期, Drenowski^[1]、Mootz^[2] 和 Kacapyr^[3] 等都作出了积极贡献。正如 Noll 所指出的, 通过发展理论模型和推进经验分析水平, 生活质量研究增加了我们有关人类幸福的构成因素和决定因素的知识, 阐明了不同人群福利状况的变迁和原因。^{[4](PP151-181)} Cobb 也强调, 如果要测量生活质量, 就必须要有关于好的生活状况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理论。^{[5](P6)(PP71-89)} 在其后的发展中, 这一理论与人类安全理论、人类发展研究和社会资本理论等理论密切互动, 共同推进了社会指标研究的发展。^{[6](7)(PP71-89, PP91-108)}

与此同时, 社会质量理论也为社会指标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立脚点。与生活质量理论相比, 这一理论出现较晚(主要在 1997 年之后), 但这一理论为分析社会状况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它以社会指标作为分析工具, 建立了一个包括 95 个指标, 涉及 18 个领域和 49 个亚领域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这些指标按照社会质量状况的四个基本维度设立, 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根据这些指标, 欧洲学者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于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质量状况进行过描述或分析, 在 21 世纪的前 10 年, 有关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讨论也在亚洲社会中出现。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指标对于分析社会质量状况的效用。

社会指标的研究与社会统计和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社会指标的研究经常会采用各种客观指标来反映生活状况(包括人均 GDP 等经济指标和婴儿出生率等人口指标), 而社会统计学科的发展为丰富社会指标的研究提供了技术手段。但是, 尽管这些客观指标具有可计数性且不受人们观念影响的优点, 但它们对于我们理解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实际状况还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这种状况不仅要依靠客观指标, 更要通过主观指标来反映。事实上, 人们对于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感受”。在此, 通过社会调查的方法所获取的资料既包含了主观因素,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客观状况。

由于社会调查所反映的状况可以是对于社会现实的客观描述, 也可以是主观判断, 因而在

使用调查资料时, 我们一方面要通过这些调查资料来反映社会现象, 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它所具有的主观性的特点。为此, 在使用调查资料来反映社会状况时, 我们可以将调查数据和指标区分为两类: 一是人们对于其生活状况的评估和描述(这一类指标和数据具有较大的客观性), 二是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度、看法和感觉(这一类指标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要切实地反映人们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 这两类指标都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社会调查问题反映的是人们的看法和评估, 属于主观指标的范畴, 但调查资料统计数据所反映出的共同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现象的客观性。

二、社会质量调查(SQSQ)及其背景

本研究将根据社会质量调查的数据(social quality survey questionnaire, SQSQ)来分析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理论所具有的方法论特征。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六个亚洲社会所展开的社会质量调查项目。这一调查在 2009 年到 2011 年间进行, 由亚洲社会质量研究联合会成员在各地展开。展开调查的研究机构有: 日本千叶大学的政策研究系, 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发展和政策研究所, 浙江大学欧洲研究中心, 台湾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泰国王七世研究院。此外,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公共健康系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由于这些调查是基于同样的 SQSQ 调查问卷展开的, 对这些数据从两个理论视角分别展开分析, 可以确保本研究有关方法论的讨论具有经验基础和可操作性。

当然, 在这些调查中, 各地调查所选择的调查对象和调查范围各有区别: 日本、韩国和泰国的调查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样的, 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 调查分别在杭州市和台北市展开, 因而而是城市水平的数据(同时, 香港也是一个城市, 是城市水平的数据)。这种状况可能会给所收集的调查资料的可比性带来一定的困难。为了应对这一问题, 我们将研究的对象设定为来自于这些东亚社会的调查参与者, 因而所得到的数据资料所反映的就是这些调查对象群体(如

韩国群体、泰国群体等)对他们的生活质量状况和社会质量状况的描述和看法。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武断地推论这些调查数据就反映了韩国或泰国这些社会所具有的生活质量或社会质量的总体状况。对调查对象的这一界定为我们的研究结论的普遍性设定了限制,但这一限制也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

事实上,这种处理方式或许是在有限的调查个案的资料基础上能展开比较研究的唯一途径。在这些社会中,其人口规模的大小和人群同质性差异很大。以中国大陆为例,即便我们使用 3000—5000 份调查问卷也未必能够真正反映出中国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状况。但如果我们采取小样本(如本次调查中 1600 份样本)在全国范围展开调查,其结果很可能是无意义的。由此,本研究只能以来自东亚六个社会的 7000 多个调查样本资料,来说明被调查对象对于这些社会的社会状况的基本看法,而不是论证这些社会所具有的生活质量或社会质量的水平高低。

基于这一立脚点,本研究在讨论过程中尽管会不可避免地谈及各社会人群在一些社会问题回答中得分的高低,但其研究焦点不在于比较其得分的高低并排序(而这是生活质量研究常常采用的方式),而在于展示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这两种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分析方法的特点。为此,上述样本的个案方面的困难并不构

成展开本研究的障碍;相反,这些社会调查所获的数据可以为我们展示这两个理论的方法论特点提供良好的经验基础以实现本研究的研究目标。当然,在这些社会质量调查的数据中,由于本研究只聚焦于东亚社会,因而澳大利亚的资料未被纳入这一比较研究中。

三、从生活质量理论的角度来测量生活状况

由于社会指标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如何选取有效的社会指标来进行社会测量就成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生活质量指数选取三个指标作为关键因素,即财富的获得(例如是否有收入)、寿命的(例如寿命期望)和人们可以具有快乐生活的年份的长短;也有的选择大量的社会指标来进行论证,包括收入等经济指标,也包括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指标和幸福感或满意度等指标。这种状况使一些人批评说,在当前的生活质量研究中,人们对于分析指标的选取往往是混乱的。本研究将参照以往的研究,采取一些最基本的和常用的指标来反映人们的生活状况。这些指标主要包括收入、就业、医疗、教育、环境和社会关系这六个方面,也包括了人们满意度的主观指标。但由于本研究关注生活质量的社会因素,因而排斥了测量生活质量心理方面的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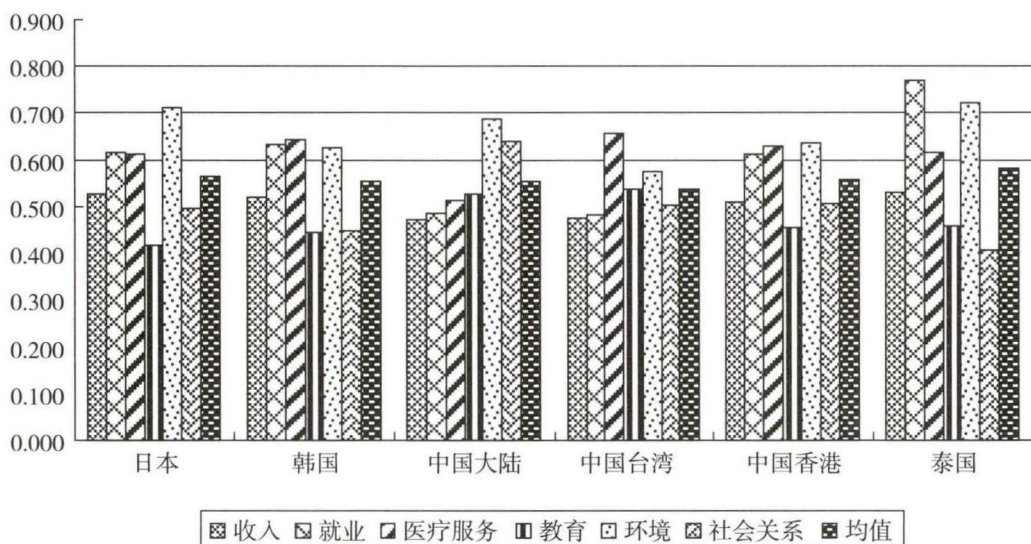


图1 生活质量的现状评估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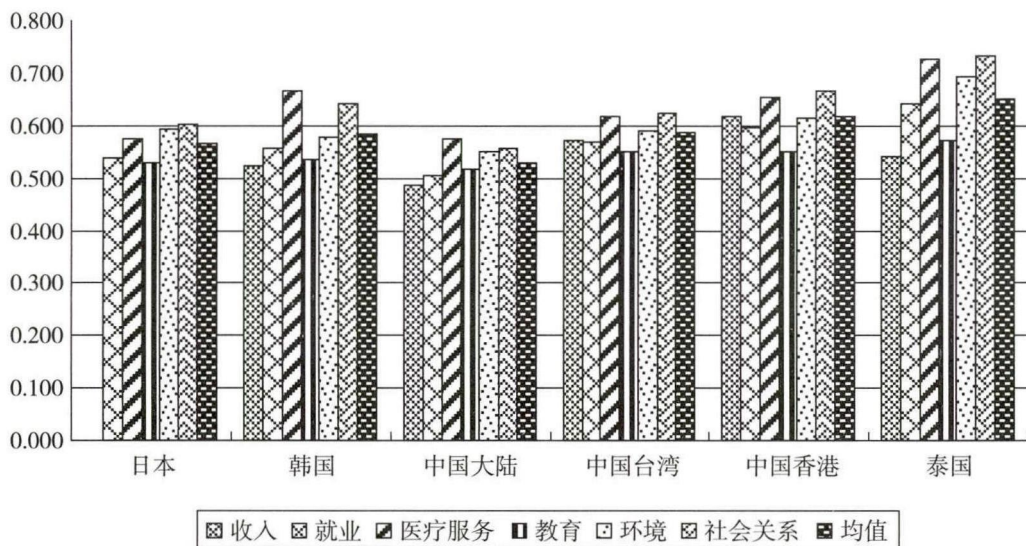


图2 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图表

根据调查数据我们看到,日本的被调查群体在环境方面的指标上给分较高,而在教育方面的指标上给分较低;韩国群体在医疗服务方面的问题上给分较高,但在教育和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给分较低;大陆群体和台湾群体在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给分较高;泰国群体在就业方面给分较高;香港群体在健康和环境方面给分较高,但在教育方面的问题给分较低(见图1)。尽管各群体间具有这些差别,我们仍可以看出在这些社会中,人们给医疗和环境方面的打分一般较高,而在就业和社会关系项上给分较低。这种状况可以反映出这些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共同问题。

当然,这些资料显示在所考察的各社会中,各个社会的得分差异很大。由于它们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和经济发展水平,在社会体系方面的教育和就业状况以及它们在市场状况方面的就业状况都各不相同,我们很难根据这些数据来得出有关它们生活质量的比较切实结论。而且,这些社会在一些方面得分较高而在另一些方面得分较低,因而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数据中,难以得出哪些因素是决定生活质量总体得分的主导因素。在对这些因素状况的进一步讨论中,我们也要关注被调查者在这些方面所具有的主观感受,因为在生活质量的考察中,个人的感受、满意度和愉快等主观指标也应当被考虑进去。

在对于生活质量状况的考察中,研究者常常强调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客观指标来判断生活质量的高低,因为这些指标并不能完全直接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正如 Schneider 所说的,没有可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能使人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社会指标的累加来真实地反映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感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人们的幸福感却并不低。^{[8](PP297-305)}为此,我们在所调查的六个方面都设计了满意度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与人们对现实状况的描述性指标的状况进行比较。这一比较显示两者对问题的回答情况基本契合,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见图1和图2)。例如,人们在医疗方面满意度的得分一般较高,但在就业方面上的得分则较他们的现实情况的描述要低。

如果我们进而把人们的满意度得分与他们对现实状况给分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人们对物质生活、社会关系和医疗等方面满意度较高,而对教育和就业不满意(见图2)。从均值来看,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满意度高于其现实感受。这种满意度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对于生活的期望水平相关,因而我们很难确定这些数据是否能“客观地”反映这些社会所具有的生活质量状况。由此,无论是客观指标还是主观指标,我们都无法得出对于这些社会各方面状况的综合和形成整体认识。这就制约了按照社会指标来给各个社会进行排序的意义,

也很难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整合来形成该社会的总体判断。因此,生活质量的分析方法在评估社会状况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四、从社会质量的角度来展开社会指标的测量

由于生活质量的考察以个人的生活状况为焦点,因而其研究也会涉及个人生活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例如涉及社会保障、政治自由、性别平等因素)。但是,社会指标研究主要并不是专门针对这些社会环境因素来展开分析的,而且生活质量的分析也不是专门针对社会环境因素来展开的。社会质量研究的焦点则从对个体生活的考察转向整个社会,从而使这一理论可以揭示一些生活质量理论所不能揭示的内容。与生活质量的研究不同,社会质量的分析沿着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这四个维度展开,并由此来建构社会指标分析体系。在本研究对于调查资料的

分析中,我们在这四个维度上都采用一些指标和调查数据来反映社会状况。根据对这些问题的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在社会质量四个维度上计算调查数据所具有的得分。

与生活质量指标的分析方式一样,我们从社会质量角度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从而反映社会状况。通过对这些数值的比较可以发现:1)泰国的社会质量得分很高;2)中国大陆的社会凝聚得分很高,但社会包容和社会参与得分较低;3)台湾和日本的社会质量得分较好,且在四个维度上的得分相对平衡;4)香港的社会质量得分处于中间位置,其得分除了在社会参与这一维度的得分较低外,在其他三个维度的得分都较高;5)韩国在社会参与维度的得分较低。结合上述的数据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社会中社会质量四个维度之间的强弱是不一样的。社会质量几个维度的关系在各个社会中都会有所不同,并不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其基本情况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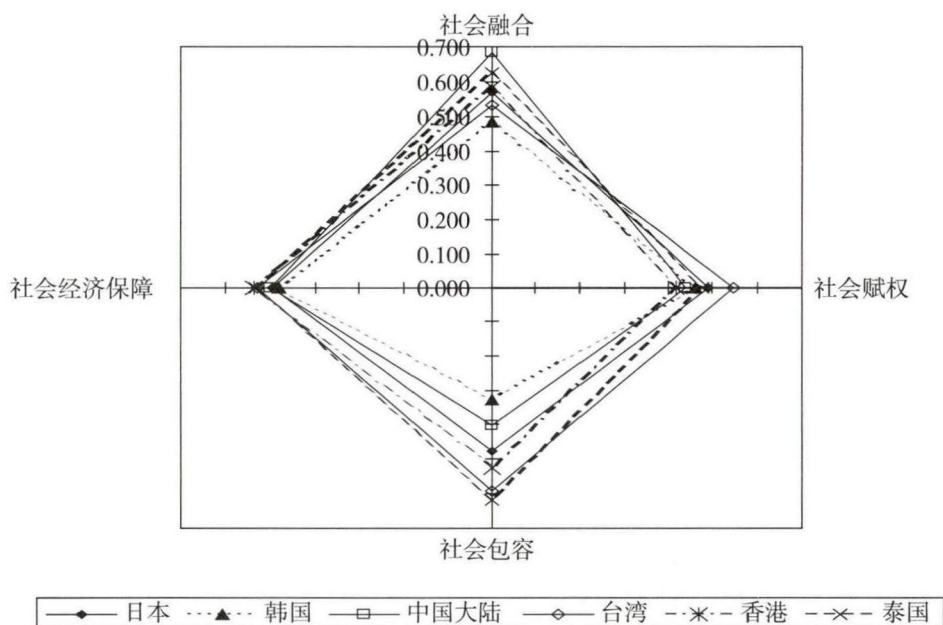


图3 各社会的社会质量状况图表

表1 社会质量分析各维度值的离散度图表

项目	维度	最小值	最小值	中值	离散度
社会经济保障	6	0	1	.51	.023
社会凝聚	6	0	1	.58	.070
社会包容	6	0	1	.50	.116
社会赋权	6	0	1	.47	.045
平均值	6			.51	.044

即便如此,我们通过数据比较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特点。在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中,我们看到所有地区在社会凝聚维度的得分都较高,而在社会参与维度的得分较低。这表明在总体上说,在所考察的这些东亚社会中社会参与是最为严重的问题。同时,这些地区在社会经济保障维度上的得分相近,而在社会包容维度上的得分有很大差异。这一差距可以通过计算各社会之间在各个维度上的离散度显示出来(见图3及表1)。在社会包容维度,各社会的得分的离散程度高达1.20(标准差),而社会经济保障的离散程度仅为0.29(标准差)。基于这一观察我们可以推论,各地区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它们总体社会质量得分的贡献率相似,而他们之间的社会质量得分的差别主要是由社会包容因素上的差异所造成的。由此,在所考察的这些社会中,在社会包容维度上得分越高,其社会质量的总体得分也就越高。

社会质量的分析结果给我们理解社会状况提供了许多启示: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在中国大陆)出现了“社会凝聚”维度的得分较高而“社会包容”和“社会参与”方面的得分却不高的现象,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社会包容”方面得分较低而在“社会凝聚”方面却具有高分?为什么人们对于“社会经济保障”维度的回答比较相近而对于“社会包容”维度的回答则差异较大?是否存在着决定社会质量状况的主导因素?如果我们承认在社会质量的考察中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差异较大,那么我们如何评估该社会的社会质量总体状况?这些问题昭示着我们在推进社会质量的分析进程中许多工作要做。当然,这种情况也反映了社会质量理论的特点:它不是把这些社会指标看作是单个

的因素或孤立的现象进行检验,而是把这些指标作为一个反映社会这一有机体状况的特征,从而从整体上来描述社会质量的状况。它强调各个维度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为我们评估这些社会所具有的社会质量状况提供了途径,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提供了广泛的空间。

五、比较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 两种理论的方法论差异的政策蕴意

从以上对社会质量调查资料的比较可以看到,在对于生活质量的评估中,人们在主观指标(满意度)方面的得分往往要高于其所描述的实际状况的得分;而关于生活质量的现状表述和主观满意度这两方面指标的均值又都高于社会质量方面指标的均值(见表2)。这说明在所考察的这些东亚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来说对生活状况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但是,这些基于个人生活状态的指标所反映出的生活质量状况并不能有效的反映他们对于社会环境的看法。通过社会质量考察的方法,我们看到在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反映出人们在社会包容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给分较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们对于社会状况的评估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社会包容和社会参与这些方面。由此可见,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可以对于我们分析社会问题具有其独特的功用。在社会质量分析的四个维度中,各个社会的社会质量状况在各个维度差异也很大,这为我们揭示这些社会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分析工具。

表2 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调查各项调查数据的总得分比较

		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泰国
生活质量	现状评估得分	0.564	0.552	0.548	0.536	0.557	0.582
	满意度得分	0.567	0.595	0.528	0.587	0.616	0.674
社会质量	社会经济保障	0.495	0.466	0.499	0.528	0.534	0.530
	社会凝聚	0.570	0.483	0.683	0.531	0.583	0.625
	社会包容	0.478	0.315	0.379	0.565	0.494	0.587
	社会赋权	0.492	0.459	0.439	0.546	0.417	0.476
	均值	0.509	0.431	0.500	0.542	0.507	0.555

我们观察到,这两种方法的区别不在于采用什么社会指标,而在于如何使用这些指标和其指标体系所具有的含义。在一些情况下,两者可以使用相同的指标,但相同指标的使用所蕴含的意义可以有所不同。例如人际互动、家庭关系、社会网络等方面的内容是分析生活质量的“社会关系”方面所必须考察的内容(因为它们构成了个人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社会质量的分析在讨论社会包容和社会参与时也会涉及这些指标(把它们看成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或者是社会关系建构的基本因素)。

同时,如果要比较这两种理论所具有的特点,我们还可以指出生活质量的线性分析方法和社会质量分析的结构性视角的不同。生活质量方法支持对于生活质量提升和发展的线性分析。这一“物化的”生活质量概念(主要通过和GNP相关的指标来测量)在20世纪得到了快速发展,它假定经济增长水平越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就越好。但是,作为这一导向的结果,McGillivray评价说:生活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因此其指标分析所能提供的信息并不比经济指标所反映的更多。^{[9](PP189-216)}社会质量方法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关系因素上,并运用各类指标从四个维度来阐释社会结构的特点和强调结构分析。可以认为,生活质量理论沿着发展主义的假设进行,包含了渐进主义因素;而社会质量理论在结构功能分析方面更为有效。

再者,生活质量理论和社会质量理论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前者支持现代化的理念并促使人们去追求高水平的生活,使人们产生改善生活条件的强烈的动机。这一理念引导人们关注环境、住房、教育、收入等社会指标,对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社会质量理论则通过四个维度所构成的总的分析框架来理解社会环境的状况,以社会和谐和社会融合作为其价值导向,倡导包容性社会政策的理念。当然,这两种理论的功能、作用和侧重点不同,关注的议题和倡导的政策导向也不同,但两者是可以互相支持的。

从政策意义上说,生活质量指标的运用使政府可以客观地了解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发

展状况,评估各个国家生活质量水平的差异,并采取相应的政策行动。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常常采用社会指标作为测量生活质量状况的方法,并通过政策安排来解决此类问题。而且,生活质量指标不仅是描述社会现状的工具,也是反映社会变化趋势的工具。这就使运用生活质量理论的实践意义超越个体层面而达到社会层面。因此,我们要明确两者的互补效用:生活质量方法所揭示的内涵是社会质量的研究方法所无法揭示的;反过来说社会质量理论所能揭示的内容也是生活质量的方法力所不逮的。

六、小 结

生活质量的研究经历了很长的发展阶段,它与现代化理论有着内在关系,可以用来有效地描述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形态的改变。当然,一些学者也批评这一理论把落脚点归结于个人^{[6](PP71-89)},因而强调,生活质量理论以个人作为分析的最终对象,由此这一理论在反映社会状况方面具有其局限性。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方法强调社会环境、体系、制度和规范基础,并建立了一套综合的社会测量方法以对于社会现实状况进行分析。这使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质量理论和方法是描述一个社会总体状况更为适当的方法^{[10](PP8-24)}。由于它强调社会融合和社会包容,因而在考察社会体系方面具有优势和独特性。

为揭示这两种理论的这些特点,展示其分析社会问题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本研究通过设立三类指标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第一类指标是人们对于生活状况现实状况的描述,它反映了人们对于各个社会生活质量客观状况的评判;第二类指标是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状况满意度的给分,其作为主观指标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看法;第三类指标则是人们对于社会社会质量状况的给分,它包含社会包容和社会保障等四个维度的社会质量指标,提供了理解社会现实状况的分析构架。基于这些特点,我们在强调社会质量理论的运用时,不能低估生活质量理论所具有的政策意义。

同时,本研究认为,生活质量理论和社会质

量理论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导向、社会发展理念和分析工具的使用意图。前者支持现代化的理念并促使人们去追求高水平的生活,后者则支持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倡导增进社会体系的包容性和社会和谐,以改善所有社会群体的总体福祉状况。采用社会质量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对东亚的许多新兴工业化社会十分有益,因为这些社会正在经历快速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状况在中国也存在着,因而倡导社会质量理论对于我们提升社会和谐程度、建设“和谐社会”、增进人们福祉,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Drewnowski, J. On Measuring and Planning the Quality of Life[M]. Mouton; The Hague,1974.
- [2] Morris, D, M. Measu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lds Poor: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M]. New York: Pergamon,1979.
- [3] Kacapyr, E. Index of Well-being, American Demographics, February,1996.
- [4] Noll, H. H.,2002a, “Social Indicators and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Background, Achievements and Current Trends”, in Genov, G. . , (ed.), Advances in Sociological Knowledge Over Half a Century, Paris: ISSC.
- [5] Cobb, C. W. Measurement Tool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M]. Redefining Progress, San Francisco,2000, www.rprogress.org/pubs/pdf/measure_qol.pdf.
- [6] Phillips, 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pproaches to Quality Of Life, including Social Quali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 Vol.1,2011.
- [7] Gasper, D. The Human and the Social: A Comparison of the Discourses of Human Development, Human Security and Social Qua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 Vol. 1,2011.
- [8] Schneider, M.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36,1976.
- [9] Diener, E. & Suh, E.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Economic, Social, and Subjective Indicator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40,1997.
- [10] van der Maesen, Laurent J. G. and Walker, Alan C. Indicators of Social Quality: Outcomes of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Network[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 Vol.5(1/2),2004.

责任编辑 周文彬 陈雁洁

Quality of Life and Quality of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LIN K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theory of quality of society both make social measurement by using social indicators, but their methods and focuses are different. The perspectives of quality of life theory help us understand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 and its improvement, while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heory of quality of society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ystem. Based on the social survey data conducted by the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the Quality of Asian Society and these two perspectives, we can analyze the data and indicate that these two theories have dif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It can be seen that we cannot underestimate the policy significance of the quality of life when emphasiz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quality of society. Meanwhile, as China is undergoing rapid expansion of the income gap, promoting the theory of the quality of the society is directly and realistically significant for enhancing social harmony and improving people's well-being. Therefore, the orientation and analytical methods of the two theories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rather than mutually exclusive.

Key Words: social indicators; quality of life; quality of society; social policy; comparative study; methodology